

# 日本发展合作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趋向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丁韶彬

**[摘要]** 日本是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冷战结束后第一份《官方发展援助大纲》的出台,标志着1954年以来日本的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政策从本国利益主导的阶段走向平衡本国利益和国际贡献的阶段。当前日本的发展合作强调积极贡献于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并以此保障日本国家利益。近年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以发展合作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及推动“优质基础设施”成为国际发展合作新规范,是几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向。

**[关键词]** 日本官方发展援助 发展合作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优质基础设施

## 引言

2000年和2015年,联合国先后通过《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为国际发展合作聚合力量,提供方向和指引,而且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于减贫和发展问题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发展问题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的重要议题,国际减贫和发展治理作为当今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重要性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可。

日本是国际减贫和发展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受制于和平宪法,也由于长期以来所处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所提供的现实条件和基本动力,以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为先导、包括贸易和投资等手段在内的经济外交,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目标的最重要工具。日本于1954年加入英国主导的对南亚和东南亚进行援助的《科伦坡计划》,1961年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1964年加入OECD,并在1989年和1993-2000年间取代美国,成为提供ODA最多的国家。期间,日本和美国共同主导建立了亚

洲开发银行。近年来,日本因其主导的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为框架的对非洲发展合作机制而备受关注。日本的发展合作理念和政策,不仅在双边层次上对其政策对象具有重要影响,而且作为地处亚洲的世界重要的发达援助体和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在多边层次上对发达国家援助集团乃至对全球层次上的发展治理也具有独特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官方发展援助大纲》(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harter, ODA Charter, 1992, 2003)和《发展合作大纲》(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 2015)、《外交蓝皮书》(Diplomatic Bluebook)、《发展合作白皮书》(White Paper 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及相关学术成果的考察,在简要回顾日本发展合作理念和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分析日本发展合作政策的现状,并讨论日本发展合作政策的主要趋向。

## 1 日本发展合作政策的演变

广义上,日本发展合作政策的核心是ODA,但不限于ODA。现有的文献一般根据形式、规

模、地理分布或利益诉求等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对日本ODA的政策演进进行梳理和分析。本文则着重关注日本发展合作的理念和政策的演进及其在全球发展治理体系中的地位 and 影响。据此,本文以日本发展合作政策与全球发展议题的关联性为基本依据,考察其发展合作政策的演变。作为其发展援助理念的首次正式的完整阐述,冷战结束背景下1992年的《官方发展援助大纲》和1993年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可以作为界标,把日本发展合作政策区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即国家利益主导的阶段和平衡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阶段。

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对外援助有现实主义的援助国利益论和理想主义的受援国需求论的争论,但总体而言,实际上,援助国的对外援助往往是援助国利益和受援国需求或利他主义等不同动因的综合作用结果。<sup>[1]</sup>在日本的对外援助意识形态光谱上,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一端是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如外交考虑(补偿战争受害国、修补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经济动因(获取资源与市场)、政治因素(获取受援国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的支持、追求政治大国地位和全球影响等),另一端则是对全球减贫和国际发展等全球议题的积极贡献。在战后日本的对外援助史上,本国利益和国际贡献这两种竞争性因素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 1.1 利益主导: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维护者

从1954年对外援助开始,到冷战结束之初《官方发展援助大纲》的出台,日本对外援助中为研究者所尤为关注的,是其自身的国际利益。期间,对外援助政策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不同时期其对外援助重点目标、地区和国别分布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20世纪50年代,日本的对外援助以战争赔款和恢复经济为主题。1954年10月,在接受美国援助和世界银行贷款的同时,日本以5万美元的援助加入“科伦坡计划”,开始成为援助国。其后,日本先后与缅甸(1954)、菲律宾(1956)、印度尼西亚(1958)等国签署战争赔偿和经济合作协议,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进行战争赔偿。此外,从1958年日

本向印度提供政府贷款(即日元贷款)开始,日元贷款也成为日本对外援助的一种方式,并在1965年超过战争赔款<sup>[2]</sup>,成为日本最主要的对外援助方式。进入60年代,日本加入发展援助集团(DAG,次年改为“发展援助委员会”),正式加入西方援助俱乐部,并先后成立负责日元贷款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Overseas Economic Cooperation Fund, OEDF)和海外技术合作机构(Overseas Technical Cooperation Agency, OTCA, 1974年更名为“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JICA)。同时增加了对外援助,并把它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日本把扩大出口、确保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促进日本企业海外投资作为对外援助的主要目标,同时修复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为此日本把援助资金重点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1973年至1989年,是日本对外援助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援助规模剧增,援助地域范围扩大至全球,并服务于战略利益。1978年日本提出首个ODA中期计划,并在1984年超过法国成为第二援助大国,1989年取代美国成为第一援助大国,确立其援助大国的地位。此外,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外援助有几个重要的变化。一是能源考虑的上升。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为了确保能源的供应,日本增加了对中东、非洲、中南美等地区的能源生产国的援助。在石油危机前,日本几乎全部对外援助都集中于以东南亚地区为主的亚洲,而危机过后,对亚洲的援助降低到日本全部援助的大约2/3。<sup>[3]</sup>尽管如此,对亚洲的援助依然处于日本对外援助的核心位置,尤其是1979年开启对华援助之后,中国逐渐成为接受日元贷款最多的国家。二是配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在对外政策方面,日本从“西方国家的一员”的立场出发,加强援助对西方有战略地位的国家,如泰国、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同时对越南等亲苏联的国家停止经济援助(张光,1996:41)。可见,这一时期,日本的ODA不仅是维持经济增长

和经济强国地位的政策工具,而且是为政治和战略目的服务的重要一环。三是用相互依赖视角为对外援助提供新的理由。1980年大平正芳首相提出“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强调非军事手段的安全保障。1981年日本外务省发表《经济合作的理念》白皮书,其中把综合安全保障与人道主义、相互依赖一起作为日本ODA的政策基础(张光,1996:35-37)。到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开始弱化ODA中的商业形象。在此背景下,“援助已经成为一个多维度、多目标的外交工具”,“已经从20世纪50-60年代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边缘地位上升为一个外交政策的支柱”(Yasutomo,1989:495)。

## 1.2 国际贡献:全球减贫和发展的行动者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指责日本是一个没有援助哲学的援助巨人,批评其政策基本上是为了满足商业利益,只有少量的人道主义和战略考虑。冷战的结束为日本应对这些批评提供了必要的政策空间。<sup>[4]</sup>上述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指冷战结束前日本ODA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本国利益,尤其是经济或商业利益。而日本政府的反思把日本的ODA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在注重本国利益的同时,强调对全球减贫和发展的国际贡献。此时,日本开始制定并不断更新体现其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政策理念的《官方发展援助大纲》,并已连续主持召开七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就援助理念而言,冷战结束之初,国际援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主要的多双边援助体对于受援国政治民主、人权、良治等因素的强调。这在这一时期的日本ODA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1991年4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国会提出了“ODA四指针”,即日本在实施对外援助时要充分注意受援国的以下情况:军事支出、武器开发及生产、武器进出口以及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基本人权与自由保障。“ODA四指针”的基本内容和理念在1992年出台的日本ODA史上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文件《官方发展援助大纲》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大纲强调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性和日本负有

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国际社会的繁荣而发挥与其国力相称作用的重要使命,提出日本ODA的目标是,“以支援发展中国家为经济起飞而进行的自助努力为基本点,通过广泛培养人才和建设包括国内各项制度在内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及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以谋求确保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正以及‘良治’,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可见,就目标而言,大纲突出了日本ODA的国际贡献,而并未提及日本的国家利益。大纲还确定了日本实施ODA的四原则,即:(1)兼顾环境与发展;(2)避免用于军事目的及助长国际争端;(3)在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同时,从发展中国家应优先把本国资源用于自身经济建设的观点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和研制以及武器进出口等动向予以密切注意;(4)密切注意发展中国家在促进民主化、引进市场经济以及基本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动向(张光,1996:224-225)。这份大纲对此后日本的发展合作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纲确立的“理念—优先政策—实施策略”的基本框架在2003年和2015年两份新大纲中得到延续,其所阐明的理念和原则也奠定了此后日本发展合作政策的基础,至今未有根本的改变。

1992年《官方发展援助大纲》较多地表述了国际贡献的元素,此后的1993-2000年,日本保持了世界第一援助大国的地位,但也招致了国内社会的反对。2003年新修订的《官方发展援助大纲》对日本的ODA进行重新定位,把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界定为“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作贡献,并借此帮助确保日本自身的安全与繁荣”。这种表述与1992年的大纲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了ODA的国际贡献与日本自身利益之间的关联。在阐明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新旧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种族及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对自由、人权和民主的镇压,环境问题,传染性疾病,以及极端贫困、饥荒、难民及自然灾害等全球性挑战之后,2003年大纲指出,日本作为“世界最重要国家中的一员”,决心充分利用ODA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努力将反过来以多种方式

使日本受益,这些方式包括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和人员交流,增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深化,日本在享受国际贸易之利,并严重依赖外部世界提供资源、能源和粮食的同时,将通过ODA主动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这与确保日本安全和繁荣以及促进日本人民的福利密切相关”。<sup>[5]</sup>可见其对国家利益和国际贡献的平衡考虑。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称在第二个阶段日本的发展合作注重国际贡献,力图做国际减贫和发展的行动者,并不意味着对全球议题的贡献完全取代了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说在这一个阶段,日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际合作理念和政策,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注重遵循、参与和引导国际发展合作的主导范式。

## 2 当前日本的发展合作政策框架及其特点

2015年,安倍晋三政府把新修订的第三份大纲重新命名为《发展合作大纲》,用于指导当前的日本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由“官方发展援助”改为“发展合作”,反映了日本政府的如下考虑:一是合作参与主体的扩大,除了政府,还包括地方和民间等;二是扩展合作范围,不限于过去的ODA;三是强调与发展中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5)。大纲把发展合作界定为“由政府及其附属机构进行的以促进发展中地区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合作行为”,其中“发展”被赋予广泛的含义,除了经济层面的通常内容,“也包括诸如和平建构和治理、促进基本人权及人道主义援助等行为”。<sup>[6]</sup>

### 2.1 政策框架

与2003年大纲相似,新的发展合作大纲的一个特点是注重国际贡献和本国利益的关联和平衡。在强调国际社会面临的从环境和气候问题、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食品问题、能源问题到人道主义危机、地区冲突和政治不稳定等全球性挑战之后,大纲指出,深化与国际共同体的合作关系,应对这些挑战,是日本自身可持续繁荣的关

键:“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际共同体,与日本国家利益的相关性在不断增强”。日本有必要基于国际合作原则,作为“和平的积极贡献者”,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与前两份大纲相似,新大纲包括“哲学”“优先政策”和“实施”三个结构部分。第一部分“哲学”或“理念”(philosophy)阐述了发展合作的目标和基本政策。就目标而言,概而言之,发展合作被视为“对未来的投资”,是为了“积极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日本强调其发展合作政策的基础是: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基于国际合作的原则和“积极贡献于和平”的立场,为建设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国际社会做积极贡献,并通过这种方式保障日本的国家利益。大纲阐述了如下三方面基本政策。(1)通过非军事目标的合作,增进和平与繁荣。(2)促进人的安全。主要是指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其发展合作的重点是赋权和保护个人,特别是弱势群体,例如儿童、妇女、残疾人、老年人、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少数民族和土著人民。<sup>[7]</sup>(3)以促进受援国自力更生的发展为目标,基于日本的经验和专门知识,通过援助自助努力以及进行对话与协作,开展合作。

第二部分“优先政策”包括优先议题和地区优先政策议题。其中优先议题包括三项内容:促进包容、可持续和有活力的“优质增长”并借此消除贫困;共享普世价值,实现和平与安全的社会;通过应对全球性挑战,建设可持续、有韧性的国际社会。不同于前两份大纲关注“优先区域”,2015年的新大纲用较大篇幅分区域阐述各自的“优先政策议题”。在亚洲,日本优先支持东盟共同体的建立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综合和持续发展;通过建立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扩展关于人类基本需求的合作,支持南亚地区的稳定和实现各种层次的区域潜力;支持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建构和区域合作,以促进其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长期以来,在地缘分布上,亚洲一直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居于首要地位。2016年,日本超过一半的ODA投向了亚洲国家。当年,日本援助最多的地区是南亚和中亚(30%),其后依次是亚洲其他地

区和大洋洲(26%)、中东北非(11%)、撒哈拉南部非洲(9%)、欧洲(4%)和拉美及加勒比(3%)。另外,2016年日本排名前十的援助对象依次是印度、越南、伊拉克、孟加拉、缅甸、泰国、印尼、乌克兰、菲律宾和阿富汗(OECD, 2018: 346),其中有9个是亚洲国家。在非洲,通过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机制,日本把扩大贸易、投资和消费,建设和巩固和平与稳定,作为帮助非洲发展的优先议题。在中东,日本承诺帮助这一地区应对诸如和平建构、缩小差异和人力资源开发等挑战。此外,大纲还分别阐述了对中东欧、拉美、大洋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优先发展政策。

第三部分“实施”占大纲近半篇幅,详细阐述日本发展合作的实施原则和实施安排两方面内容。在实施原则部分,大纲强调了如下原则:(1)发展合作的效率和效益原则。为此大纲强调:不同机构和不同政策环节应以一体化方式,实现日本发展合作的影响最大化;充分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发展经验和专门知识、先进技术等优势;积极开展与其他国际合作机构的对话和交流,使日本的发展合作政策更好地为国际社会所理解。(2)适当性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日本发展合作的条件性,强调应综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社会经济条件,及其与日本的双边关系。具体而言,提供发展合作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受援国的民主巩固、法治和基本人权保护的情况;避免发展合作用于军事目的或国际冲突;受援国的军事支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的开发和生产、军备进出口等情形;发展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确保平等和关照社会弱势群体;促进女性的参与;防止欺骗和腐败等。最后,大纲用超过1/4的篇幅,从改善实施主体间的协作、加强(与受援国地方政府、多双边援助体、公民社会等的)伙伴关系和加强实施的基础三个方面详述实施安排。

除了修订《发展合作大纲》,日本还广泛参与了后2015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讨论和设定(贺平, 2014),并在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后的2016年5月,成立由首相领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指挥部(SDGs Promotion Headquarters),

以保障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的有效实施,2016年12月又制定发布了落实这一议程的政策文件《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指导原则》(The SDGs Implementation Guiding Principles)。该文件也成为对当前日本发展合作政策具有全局影响的政策文件。文件阐明日本在此项国际行动中的目标和愿景:“日本希望通过分享其在国内建设可持续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作为领先的解决方案提供者(leading solution provider)为世界作出贡献。日本的目标是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措施方面成为世界的榜样,并将在日本国内和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社会。基于上述考虑,日本确立了以下愿景:成为未来的领导者,在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情况下,以综合、可持续和有弹性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改善”。<sup>[8]</sup>该文件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类目标对应分解为8类优先领域,分别说明其在国内和国际的行动方案,包括主要措施、指标和负责实施的相关政府机构等。

## 2.2 政策特点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当前日本发展合作政策的几个鲜明特点。其中既有延续的方面,也有变化的方面。其延续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在理念的表述上,2015年新大纲与2003年大纲一样突出国际贡献和国家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和关联性;二是和其他西方援助体一样,注重受援国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政治条件,注重发展合作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三是注重发挥自身经验和技術优势,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提升等内容;四是强调国内不同主体间的协调一致以及与国际主体的合作。

其变化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正如大纲名称由“官方发展援助”更改为“发展合作”所体现的,对发展持一种更为宽泛的理解,并采用“优质发展”的概念。这也体现了近年来国际社会发展观念的变化。二是在地区优先性上,在强调东南亚和非洲的传统重要性的同时,对其他不同地区的优先议题也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三是以全球

发展合作的“领先者”和“模范”自居,积极参与并试图引领全球发展议程。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在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追求全球影响力最大化的努力。

### 3 日本发展合作政策的主要趋向

近年来,日本的发展合作政策和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不断演进的被称为其发展合作政策样板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以发展合作服务于“开放自由的印太战略”和推动“优质基础设施”成为国际发展合作新规范,尤为值得关注和持续研究。

#### 3.1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冷战后,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进程逐渐成为日本在非洲的主要外交政策指导工具,是日本融援助、贸易、投资和安全关切于一体的战略举措。<sup>[9]</sup>首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于1993年在日本举行,每5年一届,至2013年第五届开始,每3年一届。其中第六届会议于2016年8月27-28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次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第一次在非洲举办。2019年8月底在日本召开的第七届会议以“通过人、科技和创新促进非洲发展”为主题,把主要议题集中于三个方面:通过创新和私人投资,加速经济转型,改善商业环境;促进有助于人类安全的有韧性和可持续的社会;通过支持非洲自身的积极努力,加强非洲的和平与稳定。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之后,中国从2000年开始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印度从2008年举办印非峰会,均为三年一届,美国也于2014年举办首届美非领导人峰会。无疑,日本是此类发展合作模式的首创者。而中国则后来居上,中非合作论坛在合作的广度、深度、力度以及规模和机制上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有研究认为,就援助结构、跨越的社会和经济部门、加强自助和人类安全的愿景等而言,中国对非洲援助在广度和深度上尚不及日本对非援助(Jain, 2016: 162)。正因如此,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日在非洲展开资源、权力和影响力的竞争(Hughes, 2009; Rose, 2012)。而这正

是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课题。

#### 3.2 赋予发展合作新使命:服务于“开放自由的印太战略”

日本的印太战略萌芽于安倍晋三的第一届内阁时期,初步形成了以日美印澳四国合作维护印度-太平洋地区开放自由的海洋秩序为主要特征的地缘战略概念。在其第二届内阁时期,安倍晋三又提出构建日美印澳四国“钻石同盟”的设想,并于2013年访美期间正式提出“印太”术语(王星宇, 2018)。2016年在内罗毕召开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期间,安倍晋三进一步扩展了“印太战略”的地缘范围和内涵,提出用发展合作连接“两洋”和“两洲”,即把自由开放的印太两大洋和亚非两大洲联合起来的新外交战略,从而赋予了发展合作服务于这一新战略的使命。此后,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正式成为日本外交的“优先领域”。<sup>[10]</sup>这一战略也很快进入了日本发展合作政策。《2017年度发展合作白皮书》开篇第一章《通过联合“两洲”和“两洋”创造机制》,就强调利用ODA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积极贡献(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8)。

#### 3.3 推动“优质基础设施”成为发展合作新概念

2015年5月,安倍首相提出优质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提出未来5年将与亚洲开发银行合作提供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优质基础设施投资。此后,安倍又宣布约2000亿美元的“扩展优质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倡议。此后,日本又在七国集团、20国集团、OECD、联合国、欧盟等多边场合推广这一概念。2016年在日本伊势志摩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日本力促通过《促进优质基础设施投资原则》,提出了“优质基础设施”的五个要素:考虑生命周期成本的经济效率和安全性;确保在当地创造就业、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社会和环境考虑;符合地区和国家层次的经济和发展战略;增强有效的资源动员。此外,还必须通过透明和公平的采购程序进行发展和管理基础设施,使基础设施向所有人开放使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2018)。

这些原则在2019年6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通过的《20国集团优质基础设施投资原则》中得到重申,并强调了基础设施对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发展的积极影响最大化原则。这表明优质基础设施已成为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共识。

#### 4 结 语

战后以来,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经历从战败国到曾经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又退而成为第三经济大国的转变,这也伴随着日本在援助体系中经历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从最初5万美元的捐赠到曾经的第一援助大国的巨大转变,2017年以115亿美元的援助次于美、德、英三国,居第四援助国地位。在此过程中,日本逐渐成为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和国际援助体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援助体,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援助理念和发展合作模式。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逐渐形成

了兼顾本国利益和国际贡献的对外援助和国际合作政策。近年来,日本力争做国际发展合作的“领先者”和“模范”,强调以发展合作积极贡献于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并以此保障日本国家利益。而其举办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推动“优质基础设施”成为国际发展合作新规范,表明日本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中国曾经是日本最大的援助对象,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实力上升,近年来已经崛起为国际发展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作为第二、第三经济大国和亚洲国家,中日两国在发展合作理念和方式上有不共性,对全球发展治理具有不同于传统西方的独特影响。两国的力量同时广泛存在于亚、非、拉等发展中世界,如何在全球发展治理中进行有效合作,是这一对邻邦面临的共同课题。

[本文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国际发展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AGJW003)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主持人:丁韶彬]

#### 注

- [1] Shimomura, Yasutami.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apans's Aid Policy Trajector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Changes and Continuity under the ODA Charter[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6: 73.
- [2] 张光.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20-22.
- [3] Yasutomo, Dennis T. Why Aid? Japan as an "Aid Great Power". Pacific Affairs, Winter 1989-1990, 62(4):493.
- [4] Jain, Purnendra. Japan's Foreign Aid: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hifting Policy Directions[A]. Hiroshi Kato, John Page, Yasutami Shimomura. Japan'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Foreign Aid and the Post-2015 Agenda[C].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6: 62.
- [5]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harter [OL].[2019-7-20]. <https://www.mofa.go.jp/policy/oda/reform/revision0308.pdf>. 2003: 1.
- [6] Cabinet Decision on th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harter [OL]. Feb.2015. [2019-7-30].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067701.pdf>. p.1.
- [7]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port 2018: Joining Forces to Leave No One Behind[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8:346.
- [8] SDGs Promotion Headquarters. The SDGs Implementation Guiding Principles [OL]. 2016. [2019-7-30].<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sdgs/pdf/000252819.pdf>.p.4.
- [9] Raposo, Pedro Amakasu. Japan's Foreign Aid Policy in Africa: Evaluating the TICAD Proces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2.
- [10]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Diplomatic Bluebook 2018: Japanese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2017[OL]. [2019-8-3].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01236.pdf>. Ch.1.

#### 参考文献

- 王星宇.日本印太战略构想的内涵与政策特征[J].中国评论,2018(7).
- 贺平.日本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政策讨论与核心主张[J].国际展望,2014(4).
- Hughes, Christopher W. 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Re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85(4): 837-856.
- Rose, Caroline. Discourses on Japan and China in Africa: Mutual Mis-Alignment and the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Japanese Studies, 2012, 32(2): 219-236.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White Paper o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2017 [OL]. March 2018. [2019-7-30].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406627.pdf>.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Japan'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Years Ahead [OL]. Sept. 2015. [2019-8-3]. <https://www.mofa.go.jp/files/000107850.pdf>.

作者简介:丁韶彬(1969—) 男 汉族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对外援助与国际发展  
联系方式 E-mail:bindian08@outlook.com

##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Japan'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y

**Abstract:** Japan is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system. After the Cold War, the first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harter* was issued, marking the fact that Japan's foreign aid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since 1954 have shifted from a stage dominated by its own interests to a stage of balancing its own interests with international contributions. At present, Japan'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olicy emphasizes making proactive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so that it can strive to secure its national interests. In recent years we see several new trends that are worthy of attention, including the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 the promotion of the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 through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infrastructure of high-quality" as a new norm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Japanese ODA;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ICAD; infrastructure of high-quality

### Author's Information:

Ding Shaobin (Male) Year of Birth: 1969

Professor a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Japanese Society

E-mail: bindian08@outlook.com

### 新版书目

## 2018年日本出版工具书一览

### 社会·文化部分

インド文化事典	インド文化事典編集委員会編	丸善出版	2018
江戸時代生活文化事典	長友千代治編著	勉誠出版	2018
大相撲語辞典	福家聡子著 木村銀治郎監修	誠文堂新光社	2018
外国人物レファレンス事典	古代-19世紀Ⅲ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編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2018
からぬけ落語用語事典	本田久作著	パイ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2018
気になる仏教語辞典	麻田弘潤著	誠文堂新光社	2018
ギリシア神話シンボル事典	ソニア・ダルトウ著 武藤剛史訳	白水社	2018
近代中国人名辞典	近代中国人名辞典訂版編集委員会編	霞山会	2018
クセがつよい妖怪事典	左古文男著 荒俣宏監修	小学館	2018
クトゥルー神話大事典	東雅夫著	新紀元社	2018
現代心理学(理論)事典	中島義明編	朝倉書店	2018
現代物故者事典 2015~2017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編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2018
ことわざ大百科	深谷圭助監修	成美堂出版	2018
祭祀習俗事典	柳田国男著	河出書房新社	2018
常用漢字字典毛筆	楷書・行書編 奥江晴紀著	芸術新聞社	2018
人口学事典	日本人人口学会編	丸善出版	2018

(待续) (资料整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津田 量)